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813JL029]

社會資本論

张洪兴
耿新
彭留英 著

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动态
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旅游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L029〕

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动态能力 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张洪兴 耿 新 彭留英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

张洪兴等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9

（企业管理文化）

ISBN 978-7-5637-3026-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关系—企业绩效—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5



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张洪兴 耿新 彭留英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	tepfx@163.com
印刷单位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82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摘 要

本研究以中国大陆地区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所获取的 151 个研究样本,探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组织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引入组织宽裕和吸收能力作为干扰因素,检验在不同情境下,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会发生何种权变变化;同时以组织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检验其是否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从而为打开“微观——宏观”研究的“黑箱”做出了一些初步尝试。通过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检验了九大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一、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从总体上看,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并无显著影响作用,仅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与组织市场动态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三、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四、当引入组织宽裕作为权变因素时,组织宽裕在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制度社会资本网络强度及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对组织市场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网络强度、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五、当引入吸收能力作为权变因素时,吸收能力在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网络异质性对组织市场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过程

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技术社会资本三个网络指标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六、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对其经营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均有积极影响。

七、组织动态能力在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和技术社会资本促进组织绩效提升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社会资本、组织动态能力、组织绩效、组织宽裕、吸收能力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8
第三节 研究程序与论文架构	14
第二章 文献探讨	19
第一节 企业绩效	19
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	25
第三节 动态能力	54
第四节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	78
第五节 组织宽裕与吸收能力	85
第六节 组织宽裕、吸收能力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 动态能力	101
第七节 文献探讨综合评论	105
第三章 实证框架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115
第一节 实证框架的提出	115
第二节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	118
第三节 组织宽裕及吸收能力的干扰效应	132
第四节 组织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	141
第五节 组织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149
第四章 研究方法设计	152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问卷设计过程	152
第二节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160

第三节	数据收集方法	177
第四节	数据分析方法	181
第五节	效度与信度分析	183
第五章	数据处理与研究结果分析	191
第一节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91
第二节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影响分析	194
第三节	组织宽裕与吸收能力的干扰效应分析	199
第四节	组织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分析	207
第五节	组织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08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12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214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15
第二节	建议	223
第三节	研究限制	229
参考文献		231
跋		296
附录		29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高速发展

从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在北京中关村诞生以来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民营科技企业连续多年以 30% 的增幅实现着超常规的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民营科技企业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国际化、出口创汇、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面、维护社会安定等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民营科技企业最近几十年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及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

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壮观的经济发展背后的驱动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的重新崛起”(亚洲开发银行,2003)。民营企业 and 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Ng,2000)。它们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到1998年已经达到将近70%(Lau & Busenitz,2001)。而这其中,民营科技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民营科技企业由于体制活,管理到位,产权机制到位,先天适应自由竞争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鱼得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 GDP 新的增长点。以科技企业为“发展极”,为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动能。在全国诸多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中,民营科技企业一般占到6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90%。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多年数据的证实(刘定平,2004)。

1978年以后的20多年间,在民营科技企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一系列新的现实挑战也逐渐摆在了民营企业家面前:(1)转轨时期由政策调整形成的获利空间消失;(2)改革开放初期的卖方市场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3)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品和服务档次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对人才和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4)企业在扩大资本积累的同时,沉积的许多矛盾制约了企业发展。这些都成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关键点则在于,如何通过提高民营科技企业自身的动态竞争能力,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成长。这些已经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理论研究界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战略研究视角的转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作为企业竞争力培育的主要指导理论之一的战略管理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对指导当时的企业竞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战略管理学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甚至“有一些本身就是真伪参半的‘欺骗之说’,它们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了互相毁灭的竞争”(Porter,1996),这就给当代的学者们和企业家们带来了“苦恼”——该如何从战略角度进行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而促使企业的持续发展呢?

事实上,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Andrews等人(1965)对公司战略进行阐述以来,企业战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Chandler(1962)的组织结构理论、Rumelt(1974)的多角化理论、BCG的业务组合理论、Porter(1980,1985)的竞争战略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点,但本质上传统战略理论遵循的都是“原子主义”的思维(Leenders et al., 2003),即将企业看成是自治的实体,其虽然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往,但外界环境是给定的、独立于企业而存在的。在给

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如何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由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最终竞争力的获得与保持是企业个体自身的事情。

战略的原子主义观点显然有悖于时代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着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视角来审视管理活动,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探询当然也需要转变自己的研究视角。事实上,企业管理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价值创造,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间的竞争瓜分整体价值,更可以通过改变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来提高整体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正价值。同样,行业结构也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好的产业结构不仅取决于产业的经济结果,更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企业的异质性资源也不是内部选择的结果,而如同生物体一样是环境适应和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中只有那些能够与外部环境匹配起来的资源和能力才能转化为企业动态的竞争能力。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核心能力形成与维持的成本,而且能够降低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陈传明,2002)。

因此,与企业战略的原子主义视角相对,如何将社会资本的观点引入企业动态能力获取的研究当中,从社会“嵌入性”(Granovetter, 1985)角度考察社会资本,尤其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能否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这种资源能否成为企业获取动态能力的要素基础之一,这种资源在转化为企业动态竞争能力的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就成为学者们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孕育、萌生和发展出了一大批有别于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而作为民营企业所有者或管理人的民营企业群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逐渐登上

了历史舞台(陆学艺,2002)。

(一)现实意义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大致经历了八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的三个高速发展阶段之后,1995年开始进入盘整阶段,一批在当地或是在全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明星纷纷陨落,从而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应该说,这些民营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但为什么会在各领风骚三五年后,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破产呢?原因就在于缺乏持续发展能力。据一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统计,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能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实践证明,这样“短命”的企业不可能形成知识积累,而不能形成知识积累的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中国的经济实体中有99%的是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中,有近80%是民营企业(中国统计年鉴,2002)。

回顾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民营科技企业在竞争能力培育方面出现的问题,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加以观察。就企业内部而言,由于民营科技企业多属中小型企业,往往受资源与能力的限制,企业规模较小、设备含量较低、创新动力不足,加之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人才机制不够灵活,这些都从不同层面构成了民营科技企业进一步发展和“二次创业”的障碍。就企业外部而言,现阶段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面临许多不利的发展环境,如民营科技企业在融资方面较之非民营企业存在着更多的障碍,尚未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从而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随意性、模糊性导致民营科技企业无法形成长期预期,进而缺乏投资信誉和维护信誉的动机;一些政府部门在履行其职能时,尚存在着不能一视同仁的情况。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奇迹,正是在企业自身资源先天不足与外部经营环境压力极大这种双重压力下取得的(耿新,2008;杨鹏鹏,袁治平,2008),而这一奇迹的成功取得,中外学者则一致归因与民营科技企业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

对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上 (Peng & Health, 1996; Cook & Wills, 1999; Peng & Luo, 2000; 边燕杰, 丘海雄, 2000; Wu & Wang, 2007)。因此作为民营科技企业“首脑”的企业家,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能动性,动员、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处理好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通过借用、整合外部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不断分解、重构和形塑企业动态竞争能力,提高民企对市场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突破内外部经营环境桎梏,并最终带来经营绩效飞跃,便成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二) 理论意义

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理论典范(龚艳萍, 2005):一是以 Porter (1980, 1985) 为代表的产业结构理论。它将研究视野放在企业所处的产业之中,即强调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是由其内部的资源决定,而是来源于企业之外,即来源于企业所处的产业或地域。另一种理论典范则是以 Penrose (1959)、Barney (1991) 和 Peteraf (1993) 等人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其研究视野局限于企业的内部环境,强调的是单个企业所拥有的异质、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和高效率的特殊资源。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管理者必须选择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有效战略,通过实施该战略实现企业成长。因此,企业内部拥有的那些异质性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两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但它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 (Granovetter, 1985; Woolcock, 1998)。

在资源基础理论指导下,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关注着企业内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尤其是企业家和知识团队)及其能力的重要作用,企业是依靠内部资源通过现有业务活动的扩张而产生竞争优势,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剩余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源状况决定的企业的能力、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

然而事实上,企业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自身拥有的资源,而且取决于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各种资源与能力(Dyer,1996)。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资源外,还有企业及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这些资源被称为社会资本。遗憾的是,这种资源并没有被纳入正式的资源研究框架中,以至于在传统理论框架下,无法解释“企业家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关键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这一事实。

正如王庆喜(2004)所分析的,之所以国外同类研究中没有将企业家社会资本作为企业资源的一种,来考察其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可能源于三点原因:一是国外企业演化的历史较长,其组织内部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能够自动运行的组织惯例,其管理体制健全,因此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相对较小,企业家的离任甚至逝去往往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的冲击;二是国外企业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其优势已经固化为深植于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具有高度的社会复杂性和因果模糊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掘企业家的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尤为困难;三是对于国外企业来说,所有权与经营分离,企业家的角色一般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扮演,其在职时间相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长期的生产与演化过程来说,可能只是这个过程的一小部分,企业竞争优势的取得,可能包括了多个企业家的努力,因此研究某在任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是不合适的。

但本文认为,是否把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纳入资源分析框架,还需要看另外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战略理论的发展而言,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技术变化的加剧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动态化,学界已越来越重视动态能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深刻理论意义。由于竞争环境复杂多变、竞争对手间互动节奏和对抗程度愈加强化、竞争内容瞬息万变,企业竞争优势的可保持性也越来越低。在动荡的环境中,竞争优势正在以逐渐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和侵蚀掉(D'Aveni,2004)。因此,动态能力思想提出,企业竞争优势的保持并非像核心能力理论所说的那样,重点在于利用

企业中给定的能力,而应在于企业所具备的更新其能力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龚艳萍,2005)。由动态能力理论观视,企业家社会资本尽管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或长期竞争优势的解释力较小,但就动态能力而言,由于其存在的动态性、开拓性、可分解性等特征(王斌等,2006),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可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期限内对其发生作用的。

其次,本文认为是否把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纳入资源分析框架,还要看企业本身的规模。一般而言,大企业运行靠制度、企业文化和集体的智慧和努力;而小企业则靠亲情,靠企业家个人魅力及其人际关系网络。与大企业健全的“机制主导”不同,民营中小企业更多的是“企业家主导”。企业家是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的灵魂,是民营中小企业动态竞争优势获取的“核心基础资源”(杨鹏鹏,2006)。所以,民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是企业必不可少的“脑筋”和“心脏”,没有他的存在,企业将无法运作(石伟军,2003)。小企业在本质上就是企业家意志的一种物质表现。

第三,从企业家社会资本角度探讨其对民营科技企业动态能力构建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所处转轨经济发展阶段的考虑。正如一些企业家所坦承的,他们将30%~50%的时间用于处理与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事项(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应当看到,在中国,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经济转型的今天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和经纬,2005),但“大政府、小社会”仍然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要模式,政府仍然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贺远琼、田志龙,2005)。因此,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时,中资企业比外资企业对企业家的依赖程度更大,而且民营企业相对国企管理者更倾向于从事非市场行为(Tan,2001;贺远琼、田志龙,2005)。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作用,更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注重保持好与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以利用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动态能力的获得与保持谋利。

尽管自民营企业家阶层出现以来,国内的研究者们从企业家个性特征(贾良定,2004;朱治龙、王丽,2004)、成长环境(张维迎,2004;李兰、彭泗清,2004)、成长路径(丁栋虹,2001)、激励与约束(利瓦伊安、牛建波,2004;付玉秀,2003;黄群慧,2000)以及企业家网络与创业(边燕杰,2006;彭华涛,2005)等角度对中国的企业家问题进行了精彩纷呈的研究阐述。然而遗憾的是,纵观这些文献,他们却大都忽略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而少数的几个研究(李路路,1995,1997;石秀印,1998;边燕杰、丘海雄,2000;郭毅、朱森,2002;杨鹏鹏等,2005),或者限于理论分析而缺乏定量数据支持,或者直接将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相联系,缺乏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关系的探讨,未能揭示企业家社会资本在提升企业绩效作用方面的内部机理。

中国文化背景下,就民营(科技)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动态能力,以及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而言,实证性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利用西方相对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企业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企业绩效因果链条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干扰性因素(企业吸收能力及组织宽裕程度)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该研究当中所发现的深层问题和相应的供给建议,将会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企业战略理论的相关研究。

第二节 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一、研究动机

尽管国外学者已经就西方情境下社会资本的要素构成及其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Coleman, 1988, 1990; Bourdieu, 1992; Burt, 1992, 1997a, 1997b, 2000; Lin, 2001),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已起步,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表述却并不一

致,其外在反映就是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分类和操作性定义互不相同。就西方学者的研究而言,大都把企业家社会资本按照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Birley,1985)、活性网络/潜在网络(Ramachandran et al.,1993)、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Ibarra,1993)等进行分类,然后探讨网络结构特性(规模、密度、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Birley,1985;Aldrich et al.,1987;Carsrud et al.,1987;Zimmer and Aldrich,1987;Aldrich et al.,1989;Ostagaard & Birley,1996;Brüderl & Preisendorfer)。从根本上讲,西方学者是从Burt(1992)结构主义的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张文宏,2003)来探讨企业家社会资本问题。与之对应地,国内学者在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问题时,则遵循了“关系”研究传统,更多从资源获取视角对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操作性界定,简单地以企业家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质量作为其社会资本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如李路路(1995)以企业家所选择的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以及该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的职务位置来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则以企业家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表征其社会资本;周小虎(2002)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是构成因子和开发、维护、利用因子的共同函数。从行动者的社会嵌入性考虑,Granovetter(1973)曾将嵌入划分为两种类型:结构性的和关系性的——前者考虑了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的整体特性;后者则描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的种类。遗憾的是,当前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定似乎并未充分考虑该两种嵌入类型之间的权衡。简单地说,西方学者在探究企业家社会资本时更多侧重于结构性嵌入;而国内学者则在研究此问题时更多的偏向于关系性嵌入。据此,如何从“嵌入性”的根源,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制度特征,理清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及操作性定义,从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平衡的角度综合考虑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内涵,是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之务。

为何相同产业的厂商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绩效表现的差异来源究竟为何?在过去主流的战略管理文献中是以企业的资源

基础观点(RBV)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即认为原因在于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与能力(Amit & Schoemaker, 1993; Barney, 1986; Dierickx & Cool, 1989; Penrose, 1959; Peteraf, 1993; Wernerfelt, 198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研究学者们更明确地认识到了动态过程的重要性,(Dierickx & Cool, 1989; Galunic & Eisenhardt, 2001; Henderson & Cockburn, 1994; Iansiti & Clark, 1994; Kougut & Zander, 1992; Szulanski, 1996; Zander & Kogut, 1995)。而该问题一直到由学者 Teece 等人(1994, 1997, 2000)提出动态能力理论框架之后,才得以解释。“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是企业整合、构建与重新构建内部与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动环境的能力(Teece et al., 1997)。其中,“动态”指的是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而更新企业的能力,“能力”强调的则是整合和配置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以此来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简单地说,动态能力即企业“构建新能力的能力(the competence to build new competences)”(Danneels, 2008)。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动态性的将新能力加入到企业已有的能力集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Dierickx & Cool, 1989; Floyd & Lane, 2000; Helfat, 2000; Leonard - Barton, 1992; McGrath, 2001; Penrose, 1959)。环境变化有可能会使企业先前所获得的能力变得过时,或者会产生出新的市场机会,二者都要求企业必须构建新的能力进行面对(Durand & Guerra-Vieira, 1997; Levinthal & March, 1993; Schumpeter, 1942)。尽管动态能力对于企业的基业长青而言至关重要,并已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耿帅, 2005),然而当前有关动态能力问题的讨论却仍然不够清晰(Kraatz & Zajac, 2001),其经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Newbert, 2007),尤其关于“构建新能力的能力”这一概念仍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和概念的经验性落地(grounded)(Barney, Wright & Ketchen, 2001; Priem & Butler, 2001; Grant, 2002; Danneels, 2008)。因此,理清动态能力理论的意涵,进而对之做出概念化界定和测量,同时对动态能力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加以深探,便成为学者们的重要任务。